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中蒋鑫、蒋恒的老家光安村。



蒋鑫奶奶（右一）与村里2个小孩。

2014年，蒋能杰拍摄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在影院上映，这部片子记录了湖南邵阳市一渡水镇光安村三个农村留守家庭的故事，他们是第二代留守儿童，当时，村子里几乎有58%的人都在外务工，其中80%在广东省。父母的长期缺位给孩子们带来一系列的“累计效应”。

十年过去，片中三个家庭五个孩子，四个考取大学，一个学了理发。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吴国宏表示，这三个家庭孩子的命运算得上幸运。虽有坎坷，有阵痛，但也有可依恋的亲密关系。有的父母觉得幸福太抽象，不就是穿衣吃饭，有钱什么都能解决。实际上，安全依恋的发展关键期，往往在六岁之前，一旦错过，弥补起来将非常困难。

记者联系上留守儿童蒋云洁时，她已经21岁，是湖南生物机电学院大二学生。2009年，年仅6岁的蒋云洁出现在蒋能杰的镜头里，与奶奶相依为命。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出去打工赚钱，为奶奶治病。

当被问想不想爸爸妈妈时，蒋云洁略带苦涩笑着回答：“我不想，家里有个相片。”奶奶去世后，蒋云洁心里像断了一根线。直到今天，蒋云洁仍对父母有莫名生疏感，打电话也只是几句客套问候。童年留守更像一张无形的网缠绕着蒋云洁，让她不自觉地自律与紧绷。

“当时想学服装设计，但我脑子没有别人灵活。”毕业后做什么？工作好不好找？能力不够怎么办？蒋云洁好像控制不住地专注自己的缺点，只有暑假打工赚学费，她才能找回些许安全感。有时她会羡慕父母把妹妹一直带在身边，那些陪伴是她21年来从未得到过的。

范魏煜的安全依恋来自于姐姐范魏媛。出生时，母亲难产去世，父亲曾两次入狱，姐姐被迫吃下所有苦。2020年秋季，范魏煜以541分的成绩考入湖南衡阳市南华大学。谈及留守，小煜脑海中并未留下太多痕迹，他只记得村里的路不通，每天要很早爬起来上学。

相比之下，范魏媛的痛感来得强烈一些。她自12岁开始打工攒学费，第一年到东莞，就在流水线上待了十几个小时，做圣诞树上的球。50天挣了1400元，后来因为年龄太小没人敢用她。高考那年，因为付不起学费，小媛几度放弃，最后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学费也是东拼西凑。

姐弟俩与父亲关系一直很紧张，范魏媛说，父亲出狱后，不指望能帮上什么忙，只求他改过自新，好好生活。“他才53岁，连自己都养不好，还想在我这里拿钱，让我怎么接受。”范魏媛决定放手，她内心清楚，他人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控，即便是父母。

王会认为，早年的留守经历没有“过去了就好”，这种经历带来的焦虑和抵触已渗透进这些儿童期曾经留守的成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在复制父辈留守的照护模式，有的通过反向弥补中断消极情感的代际传递。

现在，范魏媛已经结婚成家，有个可爱的女儿。对待下一代，她从不强求必须带在身边，如果条件不允许回老家也是一种选择。范魏煜的想法有点不同，他说自己可能不会结婚，如果结婚，他不要孩子成为任何人，就做他自己。

导演蒋能杰是第一代留守儿童，他一直把孩子带在身边，不想留守经历在家庭重演。因为多年前，母亲打工离家的画面，